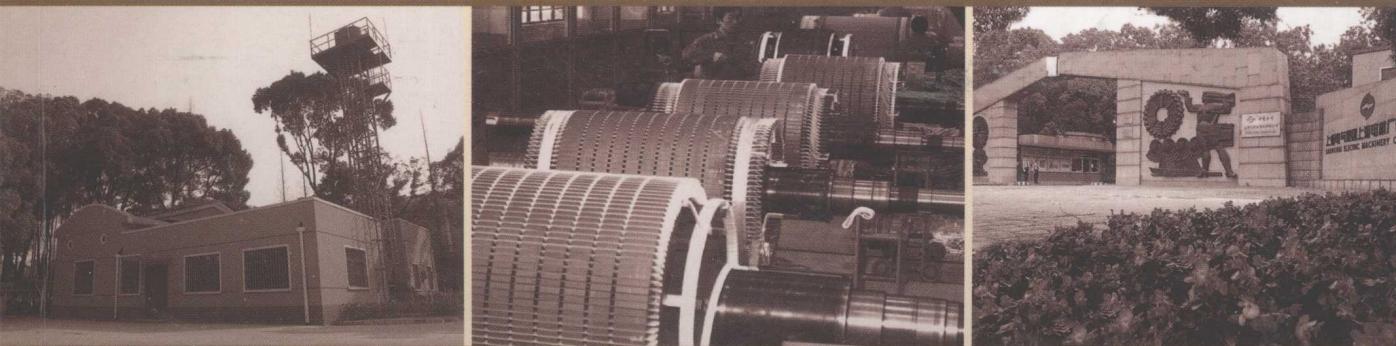


红出 叫花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

记江泽民同志与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编写委员会

K827
1205
:3

日出江花

3

记江泽民同志与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编写委员会







目 录

1 从轻工到重工	(5)
2 基本建设人才哪里来	(10)
3 第二设计分局诞生上海	(16)
4 白手起家 学习工厂设计	(25)
5 承接上海电机厂扩建项目	(33)
6 前车之鉴 引人深思	(41)



- 7 五湖四海 凝聚人心 (46)
- 8 带队取经赴东北 (56)
- 9 初步设计方案北京送审 (66)
- 10 独立思考 实事求是 (78)
- 11 关心全局 成绩斐然 (85)
- 12 四次题词 笔墨情深 (94)

1 从轻工到重工

1952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朝气充盈、蒸蒸日上。

这一年的12月，年仅二十六岁的江泽民同志，在圆满完成了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接管谈判工作后，奔赴新岗位——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电器工业设计处，任专业加工科科长。

上海的冬天是寒冷阴湿的，而走向新战线的江泽民同志心里热腾腾。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望，新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即将铺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生长、同时又接受了先进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精英们，触摸着祖国跃动的脉搏，身心充满无限活力。终于能投身心向往之的机电工业了，江泽民同志满怀喜悦。在他眼中，机电工业是“共和国的长子”，他愿意为之奉献火热的青春、无尽的珍爱。

十七岁那年，江泽民同志以优异的成绩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选择以电机专业为修学与发展方向。制造光明和动力的学科，充满阳刚之气，他为此而痴迷。年少的江泽民同志已经看到，蒸汽机的威力引出了近代工业革命，爱迪生的发明给世界带来了无限的辉煌……格物致知，思源致远，他热切期待着投身于造福人类、点亮世界的事业。尽管当时，电机还属于世界科技的高新产品，但年轻学子满怀抱负，迎难而上。

在探寻光明的求学路上，江泽民同志幸运地得到了多位名师的教导和影响。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电子学家朱物华教授是哈佛大学博士，早年回国后投身教书育人事业，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聆听过朱物华教授用英语讲授的电力传输课。在中国无线电工业还很落

后的情况下，朱物华就创设了紧跟世界科技潮流的电视学讲座。多年以后，江泽民同志还清晰记得朱老师授课的情形：“不管多么长、多么复杂的公式，朱老师从来不看讲稿，就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

江泽民同志的另一位老师顾毓琇教授是文理兼修的奇才，在传道授业中给莘莘学子留下深刻印象。顾毓琇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电机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国际知名权威，得过电机与电子领域的“诺贝尔奖”——“兰姆”金质奖章(Lamme Medel)。顾毓琇还是文艺名家，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他将戏曲《琵琶记》改为话剧在美国波士顿公演，并粉墨登场饰演主角，闻一多、梁实秋、冰心等作家同台演出。顾毓琇还编导了《岳飞》《项羽》《荆轲》《苏武》《西施》等十三部历史剧，创作词曲歌赋七千余首。在音乐方面，他破解了不少中国古代乐谱中的疑难问题，出任过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国立交响乐团团长。顾毓琇在佛学上也多有建树，出版了《禅宗师承记》和《日本禅宗师承记》等专著。1979年，他以英文巨著《禅史》震撼国际佛学界。

江泽民同志还记得他的老师朱麟五先生。这位热力工程专家毕业于南洋大学电机科并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从事发电厂建设，在发电厂的设计、建造、运行和检修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许多的大型机器厂都请他担任技术顾问。

当时的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更是享有盛名的权威人士。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系硕士，曾在西屋电气公司任工程师。1927年回母校上海交大任教，成为第一个系统地开出电机学方面课程的中国教授。江泽民、钱学森、王安、褚应璜、丁舜年、张钟俊、周建南、吴大榕、张煦、吴祖恺等政治家、学者、教授和实业家都出自他的门下或领受

过他的教益。

一代名师的教导和熏陶，令江泽民同志受益匪浅。他刻苦学习，勤奋修行，在顾老师讲授的高等数学课程中成绩尤为突出。上海交大的课程与考核制度十分严格，江泽民同志在加入地下党组织，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仍保持了优秀的学习成绩。他不仅获得了系统的机电工程学知识，更发展了持久的求知和学习能力。

江泽民同志一直铭记着他的老师，他说：“顾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师表天下，为众所敬仰。他教我们运算微积分，朱物华教授教我们电视学，曹凤山教我们电力传输，严骏教我们电机设计，沈尚贤教我们照明学……当年那些教授，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都是领衔人物。”

多年以后，每逢春节，江泽民同志依然惦念着自己的老师，他亲笔写下一张张祝福贺卡，寄给朱物华、张钟俊、张煦等老教授。1997年，江泽民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期间，还专程到费城，登门看望了顾毓琇老师。

从1949年到1952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中国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基本恢复了国民经济，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央人民政府徐徐展开了新中国的第一张蓝图：1953年至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编制中，重工业被摆上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达到八比一。而此前，由于科技基础薄弱，即使在民族工业发祥地的上海，轻工业的比例也是远远高于重工业的。



▲1987年1月3日，江泽民同志在祝贺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原校长朱物华教授执教六十周年暨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上致词



▲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期间，和夫人王治坪同志在顾毓琇教授家中做客时，同顾毓琇夫妇合影

大比例发展重工业，源自苏联模式。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两种选择：学习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或选择市场经济的模式。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按行业分工并高度集中，所有企业的生产和营销都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由国家计划部门决策。在帝国主义列强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借助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建设经验和科技力量，来提升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速度。于是，国家计委借鉴苏联经验编制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长达一百四十八页，计划书发行高达近百万册，在当年可谓家喻户晓。它以苏联“老大哥”可见的现实，构筑起未来中国的美丽框架。亿万中国人民兴奋不已，向往着为之辛勤耕耘，抛洒心血与汗水。

此时，二十六岁的江泽民同志已在益民食品一厂管理岗位和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的接管谈判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显出高于同龄人的成熟。他感悟到“一五”计划描绘的蓝图，对即将投身的重工业满怀憧憬。

2 基本建设人才哪里来

为实施“一五”计划的建设蓝图，从中央到地方，都参照苏联模式，着手进行部委构建和组织编制，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建设大业千头万绪，选贤任能是第一要务。新政权面临的是残破落后的经济，人口科技素质低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异常稀缺，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余。当时我国人口基本文化状况是：三千多万小学生、一百五十多万中学生、十多万大学生，80%的人是文盲，技术知识分子总共只有两万人。掌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说：“这些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

1952年，为满足“一五”计划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全国高校开始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集中建设一批按行业培养专才的大学，如北京海淀区学院路上拔地而起的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八大学院”，几乎在同时破土动工。青年工农积极分子以脱产、半脱产及夜校等多种方式，被选送到大学去培养……要走出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历史，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政府求才若渴。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天津市市长黄敬调任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也被调往北京，出任一机部副部长。

一机部成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整合行业内外相关资源和人才，建立适合新时期基本建设所需的组织体制，承担起新中国机械工业布局和建设的重任。许多规划中的企业亟待落实，其中有委托国外设计



▲一机部部长黄敬



▲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

的大型企业，有自主设计的大型企业，还有对原有企业的改建和扩建，基本建设任务相当繁重。而当时部里仅有的八百五十名设计人员，还分散于各地区局和企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人员和资料不易调剂。一机部即使集中所有的工厂设计力量，也只能完成 1953 年任务的 25%。根据苏联的经验和工作程序，当年施工的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在 4 月前完成初步设计。为此，一机部领导层决定：成立集中的设计机构，负责全部工厂设计工作，按照行业或重点建设地区再设分支机构。一机部部长黄敬提出了前瞻性的目标：“要把培养技术后备力量，作为机械工业的战略性任务之一。”

1952 年 10 月 22 日，陈云在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基本建设中主要矛盾是任务十分之大，而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必须迅速建立和充实设计机构和施工机构，必须下定决心调集人员建立各级专业设

计和施工组织。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要求各有关部门立即把最优秀的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投入基本建设部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批复一机部报告时,也要求各大区财委“从现有公私营企业中抽调大批技术人员,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组成各级设计部门”。

然而,从生产部门抽调人员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因为企业“抽血”之后势必会影响自己的生产计划。一时,产生了不少矛盾。

《人民日报》为这场生产经营与基本建设的人才之争留下了历史的印记。1952年底发表中央政府重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崔中的署名文章《必须使基本建设部门成为最强大的机构》,文章指出:基本建设的复杂性远超过生产。如果说生产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效率高低,那么基本建设所提出的问题则是成功或失败。文章提到不少企业仍在强调困难,强调在干部和技术人员抽走之后生产就会垮台,以此为由拒绝抽调。有人则采取拖的办法,在时间和人数上讲价钱,力争迟调和少调,还要上级保证只调这一次。崔中最后写道:“为了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人是一定要抽调的,而且需要成套地抽调出来。从发展趋势来看,迟抽不如早抽,愈迟愈被动。在一定时期内向基本建设方面不断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应当是生产方面的任务之一。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贯彻这个方针,而且还要研究出各种办法,使生产不受影响或暂时少受影响。以任何借口来延缓这一方针的贯彻,都是不能容许的。”

以《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的特殊地位,这些话对于现实局势的影响分量很重,由此可见形势之急迫。

在全国电器工业专业会议上，黄敬部长再次动员生产部门向基本建设部门输送干部，明确以北京、上海和沈阳为重点，集中设计力量，从各地生产部门抽调三百五十名技术干部，到年底集中至两千人。来自企业的代表在反复讨论之后厘清思路，表示愿意服从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支援建立专业设计机构和部门。

1952年夏，就在江泽民同志为肥皂厂的接管谈判与英商斡旋的同时，新成立的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基本建设科，在上海福州路上的汉弥登大楼（现名福州大楼）三楼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个科室是为打造华东地区新建电工企业而成立的。科长丁舜年是一位资深的电机专家，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三十年代毕



► 汉弥登大楼（现福州大楼）
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基本
建设科最初就在这幢大楼的三层
楼上办公。

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曾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实习，主持设计过国内最大的交流同步发电机和新型“华生”牌电扇。几十名科室成员中有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高层技术干部是从上海电机厂、华通开关厂、上海电线厂、南京陶瓷厂等本地区几家电工行业大厂抽调而来的。然而，电工局基建科才建立几个月，日益繁重的设计任务已令数十名科室人员忙不过来了。图纸越画越多，任务越来越重，计划每天都在更新，一切都在迅速地改变、扩张……

1952年10月，华东工业部决定，在电工局基建科的基础上组建电器工业设计处，下设专业加工等几个科室，以适应更多设计业务的需求。当年年底，电器工业设计处正式成立，调上海有线电厂的杨钊担任主管行政的处长，丁舜年担任主管技术的副处长。

江泽民同志就是在此时，由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点将，从上海肥皂厂副厂长的任上，作为技术骨干，被抽调到电工设计处专业加工科担任科长。

电器工业设计处搬到了中山东二路9号的浦江大楼，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只有一箭之遥。从杨树浦路的制皂厂到浦江大楼，相距不过几千米，但对江泽民同志来说，工作的变化却是巨大的。从轻工业跨入重工业，与新中国建设的战略步骤息息相关。光荣感与使命感，令这位学有专长的年轻党员豪情万丈。

百米之外的海关大楼上矗立着英式大钟，悠扬的报时音乐源自泰晤士河边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仿佛在提醒新中国的建设者：任重道远，时不我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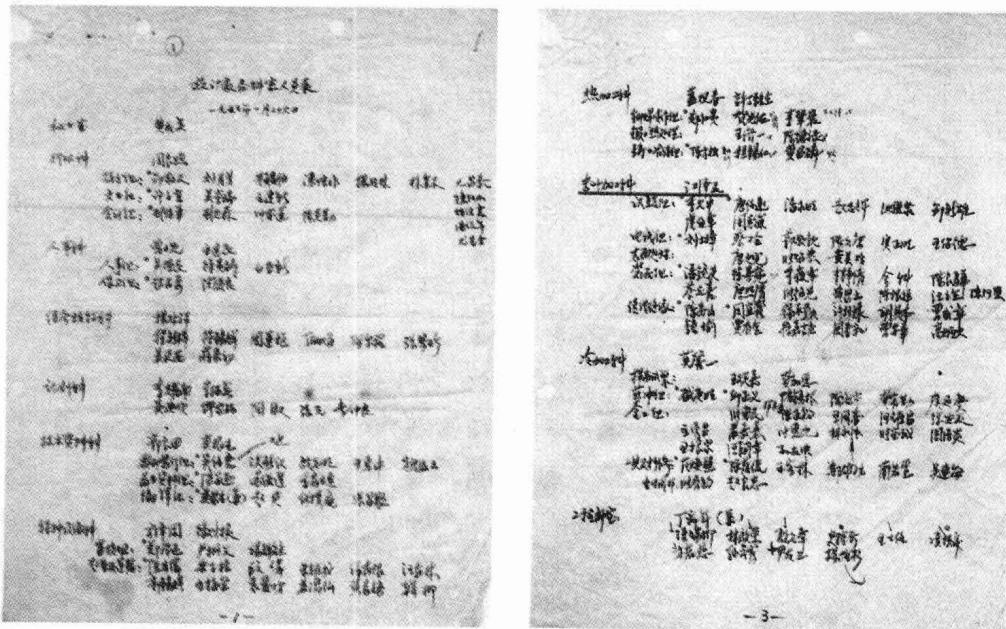


▲江泽民同志调入华东电器工业设计处，从杨树浦路来到外滩南面中山东二路9号的浦江大楼（现为上海市档案馆）上班

3 第二设计分局诞生上海

江泽民同志走马上任不到半年，他所在的机构又发生了变化。1953年初，一个更宏伟的布局渐次分明：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进入了酝酿阶段，其中第二分局将以现有的设计力量和组织架构为基础，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在上海挂牌。

酝酿中的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的基本班底，华东机械设计处和华东电器设计处，都是新建不久的专业设计机构。1952年冬，就在江泽民同志调往电器设计处的同时，不少上海国营大型机械厂的总工程师、技术科长等骨干技术力量、部分工厂基建人员，以及当年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也被抽调到这两个设计部门。从华东地区调集的一批工程师、



▲1953年1月，第二设计分局正式成立前夕，其主要组成部分一机部华东电器设计处各科室人员名单中，江泽民同志作为专业加工科负责人列在科室名单首位